

「康乾盛世」研究
丛书

陈
桦 / 主编

多元视野下的
清代社会

黄山书社

「康乾盛世」研究
丛书

陈桦 / 编著

多元视野下的
清代社会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多元视野下的清代社会/陈桦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2008.3
(“康乾盛世”研究丛书 / 陈桦主编)

ISBN 978-7-80707-886-9

I. 多… II. 陈… III. 社会发展史—中国—清代—文集
IV. 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3434 号

出版发行: 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

社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 7 层

印 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康乾盛世”研究》序言

作为史学研究,“康乾盛世”长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瞩目,而且其关注程度有愈益增加之趋势。据统计,在上个世纪最后 10 年中,以“康乾盛世”为题发表的学术文章,在中国大陆有 18 篇,而进入本世纪后的第一个 5 年里,同类命题的文章则增加到 31 篇。若以清朝康雍乾社会为背景的研究论文,则更多达数百篇。^①事实上,人们对“康乾盛世”的注意,远远超出了史学研究的范畴,其最早可溯及清代的康熙年间。也就是说,生活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已经在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康熙十二年(1673)的六月初九日,康熙皇帝设宴瀛台,与群臣共赏荷花。大学士图海等奏称:“臣等躬逢盛世,愧无寸长,仰国酬万一。今荷皇上隆恩赐宴,天语殷勤,虽家人父子无以逾此。”^②此奏明显带有阿谀奉承之意。其时,清朝统治者争夺全国政权的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举,又逢雄踞一隅的三藩异志欲乱之际,

① 数据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② 《清圣祖实录》卷四二,康熙十二年六月丁未。《康熙起居注》该条记载为:“大学士图海、李蔚等奏曰:‘臣等躬际盛时,本无寸效,正愧不能仰酬万一。今荷皇上特恩赐宴,又蒙天语殷慰,虽家人父子无以逾此,臣等何以克当。’”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02 页。

应该说毫无“盛世”之象。但是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稳固,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的繁荣,“盛世”之说遂得官方认可,并逐渐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譬如,康熙五十年(1711)以后出生的人丁,在清朝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或“盛世人丁”;高龄儒生参加科举的现象,亦被誉为“盛世休征”等等。各种所谓的祥瑞,也时常冠以“盛世嘉祥”之语。清代文献中“盛世”词语的使用也日渐频繁。如记载清朝政务活动的《清实录》,“盛世”一词在康熙朝《实录》中出现过6次,雍正朝5次,而在乾隆朝则高达37次。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辑录道光朝以前政府官员及学者经世文章的清人文集,在这部集子中,“盛世”一词被使用了31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的意愿和人们关注的程度。

“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同样受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重视。自明末以来,逐渐深入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不断地将他们所收集到的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信息传递回欧洲。传教士们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王朝的精彩描述及充满赞叹的感受,不仅使西方国家开始了解18世纪的中国,而且也唤起了他们对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浓厚兴趣与向往。沙守信是耶稣会神父,1701年来华。他在1717年去世前,大部分的时间在中国江西省传教。他曾在1703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中华帝国疆域辽阔,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王国,有的出产稻米,有的生产布匹,每个省都有它们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所有这些物品不是经陆路,而是通过水路运输的。因为这里河道纵横,风景秀丽,这都是欧洲难以与之相媲美的。”^①来华的外交官也发出了与传教士同样的信息和感叹。尼·斯·米列斯库曾是罗马尼亚外交官,先后出使过瑞典、法国等国,1675年又作为俄国使节来到中国,并于次年在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在他所著之《中国漫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找不

①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一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到还有哪一个国家,能有如此辽阔的原野,像中国人这样精耕细作,技艺高超。中国景色之优美,物产之丰盛是无与伦比的。总之,别国的稀有景象,在中国这里却俯拾皆是,再找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能是妄想。”^①

清代的康雍乾社会为何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康雍乾时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政治稳固,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国力强大。其二,康雍乾时期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康乾盛世”所处的18世纪,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间,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替代旧有的模式,大机器工业化生产不仅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观念,同时也无情地摧毁了世界已保持若干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格局及其传统的秩序。一些国家和民族在新的因素的推动下迅速地崛起,而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过度地沉迷于以往的辉煌之中而不断地衰弱。在这种迭荡起伏剧烈变动的历史演绎之中,“康乾盛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当今天人们已习惯于通过全球化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时候,研究和反思人类近世的历史,中国清代康雍乾社会及其历史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对太平富裕社会的美誉和概称,也是人们世代企盼向往的盛景和评判统治阶级治国行政的准则。在古人眼里,“盛世”的含义是多方面的。譬如,“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②这是政治上的标准。“盛世”大都以行德政为其基础。“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资戒傲。”^③政治清明,吏治良好。

① [罗马尼亚]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② 《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八》。

③ 《明史》卷八,《本纪第八》。

“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①经济上则以农为本，诸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诸多被人们誉之为“盛世”的历史时期，如上古的尧舜，汉初的文景时期，唐代的“贞观之治”，还有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这些所谓的“盛世”虽然处于中国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却具有颇为相似的共同特征，即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也许这就是世人衡量“盛世”的基本尺度吧。

不过，“康乾盛世”与以往的“盛世”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所谓“盛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封建“盛世”之中，正在孕育和成长着机器工业时代的各种因素。而与此同时，脱胎于旧的机体，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在地球的西半部蓬勃发展，生机盎然，它使得以往令人瞩目的中国封建“盛世”的辉煌黯然失色。

我们今天研究“康乾盛世”，并非对其进行简单注解，或夸耀褒扬，而是通过被称为“盛世”的各种表象，深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清代康雍乾社会的基本特点及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以及“盛世”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如前所述，“康乾盛世”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及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学术积淀深厚，研究领域广阔，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因此已经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专门的学术领域。

然而时到今日，人们还很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回顾与总结，缺少对以往所得丰富成果的整理与分析，这同“康乾盛世”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影响极不相称。因而，“康乾盛世”学术史的研究被作为本研究专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共有3部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刘文鹏等编著的《20世纪的“康乾盛世”研究》，在广泛搜集和认真阅读上个世纪中外社会有关“康乾盛世”的文论和研究成

^① 《宋书》卷二，《本纪第二》。

果的基础上,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精彩论述归纳整理,根据编著者的认识与理解,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角度,将它们原始地展现给读者,以此反映以往人们对“康乾盛世”认识和研究的发展脉络。张研《17~19 世纪中国的人口与生存环境》、牛贯杰《17~19 世纪中国的市场与经济发展》,则重点对学术界关于该时期之社会及经济的研究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回顾与总结,同时对相关问题展开学术探讨,阐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关于“康乾盛世”及其时代的考察是本研究专题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阔,我们仅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展开讨论。李强《金融视角下的“康乾盛世”——以制钱体系为核心》一书,通过对制钱的流通、供应和管理状况的分析,阐述和描绘了货币在康雍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尹树国《盛衰之界——清朝康雍乾时期国家行政效率研究》一书,则从国家行政的角度,探讨康雍乾社会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进而揭示“康乾盛世”时期的某些基本特征。陈桦主编的《多元视野下的清代社会》,以“康乾盛世”所处的康雍乾社会为重点,从更广阔的领域,以多维的角度,通过不同的侧面,考察和描述该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与演变,其研究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层社会等诸多领域。

本丛书的研究工作和出版得到了黄山书社的大力支持。在出版学术著作比较困难的今天,黄山书社的领导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推动学术研究,不遗余力,积极作为的举动和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在此谨向赵国华总编、责任编辑徐力编审,以及为本丛书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给予关心和帮助的各位先生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陈 桦

2006 年 8 月

前 言

清代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长达 267 年的时间里,它以其所特有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方式,将封建社会的演进推向新的里程,并将之带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其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应该说大都取得了可与以往任何时代相媲美的辉煌成绩。与此同时,清朝还有着其他中国封建王朝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即它是中国由古代到近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大机器工业时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时期。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生产方式以及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激烈碰撞。风雷激荡的震动与变革,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演绎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迁的多彩画卷。

就清代历史的研究而言,由于其与当代社会人所共知的影响与联系,长时期内吸引了大批优秀学者为之呕心沥血。而汗牛充栋的清代文献档案资料,则更令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们羡慕不已。然而也正由于此,清史研究的难度之大,任务之重,课题之多,也可想而知。研究领域从古代社会跨越到近现代,工业时代的各种问题,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变化,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在各个层面上的融合与对立,均成为不可忽略或闪避的研究重点。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清史研究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有所突破和发现,但这里仍可称得上是一块未经充分耕耘的学术园地。

受篇幅所限,本文集对清代社会的讨论,不可能面面俱到。作为“康乾盛世”系列研究的组成部分,“盛世”所处之康雍乾社会乃是我

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的想法是,从更广阔的领域,以多维的角度,通过不同的侧面,考察和描述该历史时段的社会发展与演变,探讨和分析时代的特征与局限,进而加深对“康乾盛世”的了解和认识。为此,本集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层社会等诸多领域。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篇幅更大一些,考察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如财政、漕运、商品经济等。

要对一个历史时段进行客观和充分的了解与研究,就不能忽视其后续时代的社会演变与走向。不可割断的历史的承继性,决定了这种“身后”研究的重要。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康乾盛世”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康雍乾社会本身,而是把视野延展于整个清朝社会,特别是乾隆朝之后的时期,将其放入更长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譬如“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以传统承载近代——从徽商看‘康乾盛世’的发展趋向”、“‘天庾正供’的危机”等文,即或是将研究工作贯穿于整个清代,或是把重点放到了嘉道及其以后的年代。这种“反思”,对于认识“康乾盛世”无疑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加强对个案和局部问题的探讨,从一个侧面,通过独特的视角,观察历史的演变,由局部透视全局,丰富人们对清代社会整体的认识,这也是本集的研究者们所力图做到的。如“地方冲突与国家应对:以清代前、中期江西万载县的土客矛盾为中心”一文,即以一个行政县为例,描述和分析了具有晚期封建社会特点的人口流动,所给与基层社会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集镇经济视角下的‘康乾盛世’”一文,则从区域经济研究入手,考察了河南集镇的状态与特点,藉此透视该地区清代商品经济的突出特点与发展趋势。

本书的结构设计,并没有追求排列布局的系统性和均衡性。入选之文章,看重的是作者在该领域长期的研究和积累,以及其成果的

研究深度与独到的学术见解,而没有过分强调其整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样做是希望我们的工作真正能够为清史研究有所贡献。

陈 桦

2006 年 8 月

目 录

清代皇帝的中国观	郭成康	1
一 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1
二 “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8
三 清朝皇帝对中国疆界的认识和自我约束		22
四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		27
五 “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32
“盛世”之变:康雍乾时期财政改革的性质与特征	陈 桦	39
一 政府面临的主要财政问题		40
二 重点突出的财政改革		61
三 康雍乾时期财政改革的基本特征		75
四 关于改革性质的探讨		91
以传统承载近代		
——从徽商看“康乾盛世”的发展趋向	张 研	100
一 近代色彩与传统本质		101
二 再析徽商特点		114
三 以传统承载近代		122
四 徽商的衰落		134

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

——集镇经济视角下的“康乾盛世”	邓玉娜	145
一 清代河南集镇发展的时间特征		147
二 清代河南集镇的空间特征		177
三 清代河南集镇的集镇规模		196
四 总结		205
18 世纪西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何 瑜 柳岳武	208
一 康乾盛世前期西方时人眼中的中国		211
二 渐入渐深——对“康乾盛世”的批判		236
三 18 世纪西方人对“康乾盛世”评价之影响		255
四 结语		261

清代前中期的地方冲突与国家应对

——以江西万载县的土客矛盾为中心	谢宏维	263
一 前言		263
二 明末清初移民迁入与驱逐“棚民”的运动		264
三 “温上贵事件”与清朝“棚民”政策的出台		271
四 清前期移民入籍应试与土著的抵制		286
五 清中期土客的族群认同与清政府的无为而治		297
六 结语		320
“天庾正供”的危机	倪玉平	323
一 清代漕政的重建与整顿		324
二 嘉道之际漕弊丛生		339
三 晚清海运步履维艰		354

清代汉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黄爱平	359
一 关于汉学成因的论争		362
二 关于汉学流派的研究		383
三 关于汉学思想性的探讨		395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郭成康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 60 年间,满洲使用的国号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

“大清国”。^①

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②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③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④“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对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取代。^⑤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⑥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

“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

①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载，清皇室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这是清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撰稿者的杜撰。清开国时期从未使用“满洲国”一称。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② 《建州纪程图记》，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1979)，第22页。

③ 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

④ 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

⑤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闰四月，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资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0页。

⑥ 据《东夷考略·建州》记载：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后，朝鲜“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4页。

的民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

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①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②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蒙古察哈尔部则称为“察哈尔国”,^③等等,可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并没有也不可能将“部落”与“国家”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区别,他们不过随着自身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认为自己有权利与汉人一样创建或更改国号。对满洲如此,对同样被明朝视为“夷虏”的其他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也是如此。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他们“建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明朝,他们心目中“中国”和“天下”的概念是什么。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5页。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辛卯年,癸巳年。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1、313、315页。

③ 《清太宗实录》卷四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谕西北蒙古喀尔喀部落查萨克图汗下使臣达尔汉囊苏喇嘛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将蒙古诸国悉以与朕,今蒙古国主察哈尔汗之子见在朕皆抚养。”中华书局1985年版。